

1963年海河水灾后的社会心态与心理救助 ——以邢台专区为例

郑清坡 郭红霄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1963年8月,海河流域发生罕见大水灾。在严重灾害冲击下,邢台专区受灾群众产生悲观失望、依赖国家救助、宗教迷信、自私本位等消极心态,致使人口外流、干群矛盾激化的现象发生。这些消极心态的产生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地方各级党委与政府通过及时救灾,以及阶级教育、回忆对比、集体主义教育、模范带动等对灾民进行了积极的心理救助,这也构成了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社会心态;海河水灾;心理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 [2018]04-0112-06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8.04.016

随着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以往学界多偏重古代和近代灾害研究的状况亟须改变,应予当代灾害史研究以足够的重视。且在以往的当代中国灾害史研究中,学界多从灾情及国家的物质救助等角度展开,对灾后社会心态及心理救助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已有灾害社会心态史研究又多集中在近代。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心态除延续旧有的特征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状态;而政府对灾民的心理救助在构成灾后恢复和重建主要部分的同时,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本文以1963年海河水灾后邢台专区为例,对灾后社会心态及政府对受灾民众的心理救助进行分析^①,以期深入了解新的历史时期灾害社会心态及救灾特征,并为当前和今后的救灾减灾提供历史借鉴。

一、洪灾冲击下的消极社会心态

1963年8月2日至9日,邢台专区各地普降特大暴雨,在此之前的7月下旬(24、25、28日)已有三次较大降雨的影响;由此造成海河南系遭遇罕见洪水,引发特大洪涝灾害。水灾的发生在威胁人们正常生产生活乃至生存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心理,从而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心态及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悲观失望的情绪。水灾发生后,许多灾民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尤其是灾情较重县区。其中邢台、沙河、临城、内丘四县,由于土地被冲毁破坏严重,作物大量减产,灾民中普遍表现出了听天由命的消极情绪,认为“人凭地,虎凭山”,土地是山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本钱,冲走了土地还干什么”^②。许多特重灾区的干部群众对灾后生产自救也缺乏信心,甚至有人放弃了晚秋作物的管理。有的生产队长一听说让管理残秋,就对社员说“大鱼饱了,捉个小虾还顶啥事?管它也是白费劲”^③。许多重灾队的干部甚至听上级一提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就头疼^④。有的干部甚至认为这场水灾造成的损失“十年八年恢复不过来”,更有人认为“三

收稿日期:2017-12-30

作者简介:郑清坡(1978—),男,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郭红霄(1989—),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体化时期河北乡村公共生活中集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HB15LS025)的阶段性成果。

①目前,有关这次水灾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集中在水灾成因、灾情实况、影响以及灾害救济和经验教训等方面,仍缺乏对灾后社会心态及心理救助的研究。

②邢台专署办公室《关于山区灾情调查情况和今后山区工作意见的报告》(1963年10月7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1—008。

③隆尧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关于我县生产救灾工作的总结报告》(1964年6月15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20—005。

④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关于当前生产救灾工作情况向地委的汇报》(1963年9月23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4—001。

十年也恢复不过来”^①。

2. 过度依赖国家救助。许多灾民认为只有依靠国家救济才能摆脱水灾损害,产生了过度依赖心态,丧失生产自救精神。如宁晋县城关有人就认为“今年全国灾不大,国家能支援咱县,不要紧,等着上级救济吧”^②。这种心态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身上,许多基层干部也存在严重依赖心理。如威县部分生产大队在向县汇报时会带两本账,先采取顶、看、靠、威的方法,扩大灾情以求增加支援;如第一套计划不行,再往前迈一小步。^③任县后西屋大队把灾民的理发费也算在救济款内,要求一切都由国家包起来;清河县谢炉公社的副书记在谈到如何渡荒时说“如果国家不救济,就是破产渡荒”^④。这种等、靠、要的依赖心态对灾后生产救灾的开展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3. 宗教迷信的蔓延。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愈来愈科学,但旧的灾异思想在邢台专区很多农村地区仍较为普遍。很多人将灾害原因神秘化,进行农事禳灾,使得宗教迷信思想蔓延。如巨鹿县西辛庄某大队长和民兵连长跟着巫婆,组织受灾群众烧香磕头,许愿上香,全村干部和党员几乎都参加,306户社员就有287户参加,向水中供猪羊32只^⑤。邢台县五仲大队村南火神庙因庙基高,洪水未冲倒,当地巫婆便宣扬是火神显灵;长信巫婆说“白马河的水是五个头的长虫领来的水,人是没法治的”^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后来,有人回忆说:那几天时不时会看到村里的一些妇女,双手合十,嘴里念着听不清的经文,求神保佑;不管之前信不信的,反正那时候都在念叨。^⑦

4. 自私本位的心态。在严重灾害的强烈冲击下,部分人暴露出畏惧逃避、消极疲沓、只顾个人的自私本位心理。据邢台地委统计^⑧,全区属于这一类型的脱产干部有1509名,占干部总数的6.24%。其中:贪生怕死、临危逃跑的78名;只顾自己,不管群众,严重失职的35名;回家不归,躲避困难的240名;趁水灾秩序混乱之机,破坏政策,浑水摸鱼,发“灾难财”或偷拿国家和集体财务的27名;幸灾乐祸,见危不救的9名;畏难退缩,工作消极的1120名。如宁晋县部分队干部带领群众哄抢国库,仅东汪、南河庄等5个村就抢了国家和集体粮食16243斤,东西847件^⑨。也有民众灾后哄抬粮价,趁机抢购粮食,如平乡乞村合营百货商店焦仁春在一个集即买麦子一千多斤^⑩。

灾后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上述种种消极心态及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到灾害救济特别是自救的顺利开展,更引发了人口外流逃荒和干群矛盾激化的社会问题。

就此时期灾后人口外流逃荒现象的发生,除人们在遇灾后延续了传统的自发自救方式外,灾后消极社会心态的滋生蔓延从而不能积极组织生产救灾也是一重要原因。据统计分析,1963年海河水灾后邢台专区人口外流呈现出特重灾区和重灾区多,轻灾区少;男劳力多,女劳力少;青壮年多,老人、儿童少的特点;其外流动机依次为:外出工作的占47%,节约粮食的占18%,从事个体活动的占17%,外出讨饭的占7.9%,盲目外流的占7%,换代食的占3.1%^⑪;其中“外出工作”“从事个体活动”多为青壮年,“节约粮食”“外出讨饭”“盲目外流”等多为老人携带儿童。^⑫而人员外流又多呈现一种短期行为,他们在灾区情况逐渐好转时多数回归,甚至部分灾民的外流是早出晚归或在外隔一两夜回归。

①中共邢台地委统战部《水灾后各界人士几种思想反映》(1963年9月12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10—002—082—009。

②中共邢台地委统战部《水灾后各界人士几种思想反映》(1963年9月12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10—002—082—009。

③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关于当前生产救灾工作情况向地委的汇报》(1963年9月23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04—001。

④中共邢台地委《关于防止和克服依赖思想进一步做好生产救灾工作向省委的报告》(1964年1月3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7—002—263—001。

⑤《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广大干部和部队官兵的表现、思想面貌》(1963年10月1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006—006。

⑥《洪水灾后的阶级斗争形势问题》(1963年8月22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7—002—227—003。

⑦邢台市平乡县东郭庄村采访记录(2016年8月25日)。访谈人:郭红霄;被访谈人:郭文,1939年生,洪水发生时任平乡县西闫庄小学教师。

⑧邢台地委组织部《关于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群众抗洪抢险和生产自救的报告》(1963年10月10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8—001—261—018。

⑨《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广大干部和部队官兵的表现、思想面貌》(1963年10月1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006—006。

⑩中共邢台地委统战部《水灾后各界人士几种思想反映》(1963年9月12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10—002—082—009。

⑪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生产救灾简报·当前灾民外流情况》第45期(1963年11月11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16—014。

⑫邢台市平乡县东郭庄采访记录(2017年8月26日)。访谈人:郭红霄;被访谈人:郭来增,1940年生,时任东郭庄第一生产队队员。

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的自私本位心态及行为势必引发群众不满,造成干群矛盾的激化。特别是部分基层干部在救灾粮、款、物的分配时挟私心造成不平等,以至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更是激化了干群矛盾。如有的生产大队群众不满的说“别人受灾倾家荡产,支书受灾大发横财”^①。然而,部分灾民的自私本位和过度依赖心理也是引发干群矛盾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某些有依赖国家救济思想的生产队,社员一看见给特重灾队的物资多就“眼热”,认为本村吃亏,埋怨干部“无能”,干部认为“挨瞅”;在社员中争夺救济资源的现象也十分严重,有贫农社员就每天找支书要救济。^②这让基层干部既怕受灾社员不听工作安排,完不成任务,又怕强制进行生产自救招致不满,在工作中左右为难。

1963年海河水灾后,邢台专区社会消极心态及行为的产生有其客观和主观方面的深刻原因。就客观原因而言,主要表现在:1.百年不遇的洪灾。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是产生消极社会心态的基本原因。此次水灾无论是对邢台专区,乃至河北全省,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超过数百年内邢台地区发生过的几次大雨大水。该年邢台专区各河流量相比1956年水灾各河流量的倍数,最大接近于17倍,最小也约为2倍。^③此次洪灾迅疾猛烈,受灾面积、程度都十分严重,全区均属重灾区。原播种秋收作物面积的824万亩,近92%受灾;其中减产8成以上到全无收成的522万亩,减产5—8成的115万亩,减产3—5成的72万亩,不足3成的53万亩。^④2.灾民生存状况低下。灾后,人们的生存状况受到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差,饮用水源污浊,卫生状况堪忧,加之灾区群众吃、穿、住都十分紧缺,灾民体质不断下降,并伴有疾病发生。11月初,邢台专区灾后累计发病113万多人,多集中在特重灾区和深水区,全区6个特重灾区县总病人127891人,占全区总病人数的69.7%。^⑤面对如此严重的灾害冲击和灾后生存条件,人们心理上遭受的冲击程度可想而知。

就主观原因而言,主要表现在:1.灾害意识与灾害经历不足。虽然邢台专署党组于1963年6月召开防汛会议评估了当年汛情,做了多套应付洪水的计划和具体措施,各县也针对地委指示开展了防汛准备工作和宣传。但各地群众却对防汛宣传“不上心”,“防汛宣传每年都有,也没啥稀奇重要的,大伙都没当回事”^⑥。部分干部对防汛工作存有麻痹思想,认为“洪水还没到来,生产要紧”^⑦。这深刻反映了很多人灾害意识的薄弱。而灾害经历的有无多寡,对人们遇灾后的心态也有直接影响。1956年8月的洪水是邢台专区灾民经历过时间距离较近的水灾,此次洪水经历并未给灾民们带来渡过严重水灾的经验。有人就认为“1956年那么大的水也没受什么损失,今年水再大能大过1956年”^⑧。当发生严重洪水时,惊慌失措的民众产生悲观失望等消极心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信息的不确定性。在灾害中人们大多会搜集或整理相关信息以了解灾情,而许多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且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为夸大或误传,更加剧了消极社会心态的蔓延。灾害初期,宁晋县许多地方流传“一场大水冲没了穷富,没有阶级斗争了”“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时候到了”^⑨。而部分特重灾生产队清除灾前工分的决定又被部分有心人曲解为劳动报酬制度在灾区的取消,谣言遂在灾民中广泛传播。这使得部分灾民对依靠集体渡荒的信心逐渐动摇。而部分干部有意夸大灾情以缓解其工作压力或要求更多救济的行为,也加大了灾民的恐慌不安心理。

二、心理救助与积极社会心态的树立

不可否认,1963年海河水灾发生后,灾区不乏积极的社会心态。许多人在遭遇初期的恐慌心理后,对灾情的适应心理逐渐占据主导,并积极寻求自救。一些过去受过水灾的地区,拥有生产救灾的经验,群众情绪

^①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生产救灾·干部多吃多占的几种形式》第13期(1963年12月10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19—014。

^②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柏乡县内步公社南大江大队克服了依赖思想,开展了互助互济,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掀起了生产自救高潮》(1964年1月13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22—003。

^③《关于灾后群众生活安排情况向刘省长的汇报》(1963年10月15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01—007。

^④《关于洪水灾害情况》(1963年10月3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006—003。

^⑤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生产救灾简报·当前病情情况》第43期(1963年11月5日),邢台市档案馆藏D112—001—120—014。

^⑥邢台市平乡县东郭庄访谈记录(2017年8月26日)。访谈人:郭红霄;被访谈人:郭来增。

^⑦邢台市平乡县东郭庄访谈记录(2017年8月26日)。访谈人:郭红霄;被访谈人:郭志书,1942年生,时任东郭庄第一生产队队员。

^⑧邢台市平乡县东郭庄访谈记录(2017年8月26日)。访谈人:郭红霄;被访谈人:郭来增。

^⑨宁晋县人民委员会《关于1963年8月—1964年6月生产救灾工作总结》(1964年6月),邢台市档案馆藏D005—002—020—001。

比较安定,对于灾害的发生也能够快速适应并作出积极反应。如南和县白佛大队灾后就迅速建立了“抗灾委员会”,下设修房股、生活股、生产股、副业股、牲畜股;五个支委各领导一个股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暴雨结束后就迅速修盖房屋32间,组织劳力排水、种菜。^①邢台专区西部山区几乎每年夏末秋初就会发生山洪暴雨,人们不得不年年防灾,因此在灾害发生后,他们很快适应,发挥了省吃俭用的精神,积极展开生产自救。^②

但灾后初期,消极社会心态的滋生蔓延速度以及影响程度都要远远大于积极的社会心态,其对救灾的顺利开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冲击破坏影响,且多数情况下消极的社会心态并不会主动自然的向积极心态转变;这就需要及时予以有力干预,对民众进行心理救助,清除消极心态,扶持和树立积极的社会心态。由于灾害发生后人们各种消极心态的产生相当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基本生活甚至生存条件缺失的恐慌,因此,及时的救灾对稳定人们心理,使消极心态向积极心态转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心理救助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一旦得到政府救助,灾民的生理和心理危机都将有所缓解。

在1963年8月的抗洪斗争中,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邢台专区当地驻军等都给予灾区很大支持,解决了抗洪救灾的急需。9月,邢台专区政府部门还对各地方具体受灾情况进行调查,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了解受灾群众思想动向,特别是他们对生产救灾的认识、态度等。^③邢台专区的党委和政府展开的救灾也是结合各县灾情,重点解决灾区最急需的东西。如为恢复农业生产,鼓励灾民生产自救,政府向受灾群众发放效果明显的短期农业贷款,以缩短灾期,还大幅放出种子、饲草、饲料等事关恢复农业生产最为急需的物资等。虽然因财力、物力短缺,政府救助有一定局限性,但国家的及时救助是灾民开展积极自救、恢复生产的强大推力,灾民中的消极心理也因此逐渐改观。

洪水期间,邢台专区各县广泛的向群众宣传中央、省、专区等的紧急指示、救灾政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多次组织干部深入灾区进行慰问,引导灾民正确认知灾害,对安定灾民情绪起到很大作用。此外,邢台专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对灾区民众进行了积极的心理干预和救助;教育灾区干部群众生产自救,节约渡荒,鼓励他们树立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思想;并通过各种会议,着力解决部分干部群众的悲观情绪、等待救济和各奔前程等消极思想,以提高思想认识,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方面。

1. 阶级教育。水灾后,针对部分干部群众中出现的灾民意识等问题,邢台专区各县公社、大队都因地制宜地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贫下中农后其他群众的方法,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向党员进行党章教育,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教育,要求他们团结中农,依靠集体搞好生产自救,以保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如新河县尧头大队党支部在灾害发生后就认为人们产生消极心态的主要原因是近期缺乏阶级教育,一些党员干部、社员忘记了旧社会的苦,年轻人不懂得阶级剥削和压迫,缺乏爱憎分明的阶级观点。于是,该大队党支部决定用大讲村史、家史的方法,向全体党员、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教育;以端正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依靠集体、依靠生产自救渡荒的信心。^④

2. 回忆对比。在大讲阶级形势的基础上,地方党委和政府还利用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向广大民众进行教育。各县委还组织和训练了宣讲队伍,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开展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教育。如临城全县212个大队就有188个大队进行了回忆对比教育,全县109318人中受教育的达52261人。^⑤通过这种新旧社会遭灾结果对比的教育方式,以激发受灾群众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进一步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悟。许多地方的消极社会心态得到改观,如隆尧县柏舍公社的轻灾队,利用本队与外队、现在与过去、本社与外社的三比方法来克服干群之中存在的畏难情绪和伸手向上思想。^⑥

3. 集体主义教育。区域的差异性会产生各地方受灾程度和灾害承受能力的不同,这就需要各地方各部门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展开互助互救。水灾发生后,柏乡、隆尧、威县等6个县,发动轻灾队给重灾队育白菜

①邢台专区防汛指挥部《关于抗洪救灾情况向地委的第一次报告》(1963年8月14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1—0016。

②邢台专署党组《关于山区1964年至1970年远景规划和今冬明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安排意见向地委的报告》(1963年11月28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1—010。

③《回乡干部调查提纲》(1963年9月),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3—015。

④《尧头大队党支部是怎样通过讲村史、家史向干部、社员进行阶级教育的》(1963年11月5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9—002—097—020。

⑤中共临城县委宣传部《关于开展生产自救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情况向地委的报告》(1963年10月24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9—002—099—039。

⑥隆尧县救灾委员会《关于我县生产救灾工作的总结》(1964年6月15日),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20—005。

和芥菜秧 500 多万棵;隆尧县还组织了西部轻灾区几个公社的社队干部到东部重灾区慰问,使他们认识到多种菜支援灾区的重要性。^①邢台地委和各县还召开了生产救灾会议^②,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消除畏难心理,坚定集体主义,树立依靠集体渡过灾荒的信心。参加会议的许多社、队干部检讨了生产救灾中忽视集体力量,甚至对集体渡荒发生动摇的思想行为。通过此次教育基本解除了灾前轻灾区怕算细账、怕说实话、怕同舟共济的思想,树立和坚定了他们与灾区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意识。

4. 树立模范典型。生产自救的开展,模范典型起了重要的带动促进作用。邢台地委宣传部编印了“战斗通讯”,表扬大批模范单位和个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舞抗洪斗争和救灾工作。各级党组也都随时通过文字通报和各种会议,大力表扬在抗洪斗争中的好党员、好干部、好社员。邢台地委还把全区表现最好的 11 个支部书记、3 个党员大队长和 2 个党员的材料编印成册,动员全体农村党员、干部进行学习。^③从专区各级党组织对模范典型的选择标准和劳动模范典型事迹来看,都遵循了积极参与抗洪斗争和生产自救的原则,符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为集体努力作贡献等品行特征,反映出政府欲将积极社会心态引导到灾后生产自救的诉求。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及时救灾和心理救助下,积极的社会心态在灾区逐渐树立起来并进一步拓展。公而忘私的集体精神,积极的自救与互救逐渐取代悲观失望、依赖国家救济等消极心态。救灾过程中树立的众多模范典型就是公而忘私集体精神的生动体现,特别是涌现出的许多牺牲自我,抢救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利他心理和行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如任县新市支书张文录昼夜领导群众抢修护村堤,并将自己房子拆掉提供固堤物料;在他的影响下,130 多名群众都把可用的物料捐出,用以加固堤堤,保障了全大队的安全。^④

在经历了水灾发生时的被动无助心理阶段后,经过政府宣传教育鼓动式的心理救助,灾民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和信心被大大激发。他们认为“只要齐心努力,依靠党依靠集体力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年不行看明年,只要把麦子种好就有奔头,再加上把残秋秋菜管好,生活还是没问题的”^⑤。人们很快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组织力量进行自救。处于洪水包围中的各级干部动员群众组成专业救援队,动手绑扎木筏,在高地搭救生楼,并充分利用各种船只、门板、簸箕等救生工具,抢救和保护财产。^⑥抓住洪水脱落的机会,各县群众在县、公社、大队干部的动员下,开展了抢粮、挖物(即被洪水掩埋的粮、物)活动。邢台专区为恢复灾后的生产,加强农作物的后期管理,还在一些非灾区和轻灾区开展不减产和超产运动。^⑦

在积极自救过程中,各地区人们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展开的互助互救对灾民渡过艰难时段,树立积极心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内丘县在解决灾民的吃、住问题上就采取了广泛的互助救济,其中解决灾民住宿的办法为:组织灾民投亲靠友,以亲代邻;发扬互助精神,发动没有受灾或房屋较多村庄的群众,腾出一部分房子进行安排;搭了 500 个席棚,解决临时住宿。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为:先吃自己的,后吃集体的;发动村与村、户与户,互借互济;依靠亲友,互助救济。^⑧在救灾中,县与县、村与村之间的“灾时共产主义”精神得到充分发挥。邢台市前炉子公社提出“一户受灾全队支援,一队受灾全社支援”的口号,并在本公社 60% 房屋倒塌的情况下,仍积极安置东郭村灾民,支援其 85 个席子以供搭棚。^⑨受灾群体之间的互助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洪灾给人们带来的经济损失,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和创伤,促进了积极社会心态的树立。

三、结语

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在造成社会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更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冲击。1963 年海河

①《关于灾后恢复生产的情况》(1963 年 10 月 1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06—015。

②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关于当前生产救灾工作情况向地委的汇报》(1963 年 9 月 23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4—001。

③《关于灾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和今后的安排意见》(1963 年 10 月 1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06—017。

④《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广大干部和部队官兵的表现、思想面貌》(1963 年 10 月 1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06—006。

⑤中共临城县委宣传部《关于开展生产自救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情况向地县委的报告》(1963 年 10 月 24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9—002—099—039。

⑥《我们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开展抗洪救灾斗争的》(1963 年 10 月 1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06—004。

⑦《关于灾后恢复生产的情况》(1963 年 10 月 1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06—015。

⑧邢台专区防汛指挥部《关于抗洪救灾情况向地委的第一次报告》(1963 年 8 月 14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1—0016。

⑨《在抗洪救灾斗争中广大干部和部队官兵的表现、思想面貌》(1963 年 10 月 1 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006—006。

水灾发生时和灾后初期,消极社会心态滋生蔓延并一度占据主流地位,严重影响生产救灾的开展。就各社会群体心态在水灾中所受冲击程度而言,被阶级划分为“地、富、反、坏”的社会群体更易受到灾害的影响,他们的消极心理也较其他群体更为普遍。这一点从阶级教育、回忆对比,以及凡指摘消极心理滋生蔓延缘由更多指向他们时,表现的更为明显。虽然这个时期也存在积极的社会心态,但其存在区域多受限于轻灾区或有受灾经历和救灾经验地区,影响面尚不大。随着国家对灾区及时有效的救济,及心理救助的展开,积极的社会心态逐渐高涨,并开始逐渐排除消极心态,树立起了以生产自救和互救为中心的积极社会心态。在此过程中,灾区的社会心态和政府的心理救助也印上了显著的时代特征。尤其政府对灾区干部群众的心理救助,基本都是通过宣传动员和各种教育来体现的。

集体化时期,国家和集体是灾害救助中的主要承担者。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在提高救灾效率和效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其他影响,其中灾区干部群众过度依赖国家救助的心态就是一主要表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曾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的救灾口号,此后十几年来一直被视为各级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做到的政治任务,在灾后救助中会想尽办法解决灾民的吃、穿、住等问题。这虽然能够很好的帮助灾民渡过灾害时期,但也容易使部分干部群众滋生过度依赖国家救助的心态。长期的集体化体制使农民对集体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归属感,以致思想和精神上的依赖感,在国家、集体包办一切的情况下,遇灾时部分人的自救能力弱化和产生依赖心理也就在所难免。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乡村邻里之间地缘上的亲和关系。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们更会互助救济、共渡难关,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

正是集体化时期国家的无处不在,使得政府在对灾民进行心理救助时带有了比较浓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色彩。通过各种心理救助不但增强了民众自救和互救的信心,更增强了他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凝聚了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爱国情怀。在邢台专区灾后进行阶级、回忆对比教育时,参与的民众就说,“今年闹了这么大的灾,有吃有穿,要是旧社会闹这么大的灾,就活不成了,可沾了社会主义大集体的光,今后要加倍爱护集体。”^①在此,民众在回忆对比中更加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和集体制度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陆影)

^①邢台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柏乡县内步公社南大江大队克服了依赖思想,开展了互助互济,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掀起了生产自救高潮》(1964年1月13日) 邢台市档案馆藏 D005—002—022—003。